

# 聂耳与田汉:志同道合的“黄金搭档”



▲聂耳(左)与田汉(右)

生于云南昆明的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天赋异禀的他跟木匠学二胡、竹笛等民乐,课余又跟一位法国教师学习乐理和钢琴,小提琴则是读师范期间跟一位小学音乐老师学的。熟悉聂耳的人都说,只要能从耳朵进去的,都能从他嘴里唱出来。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聂耳”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田汉(1898-1968)本名田寿昌,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农民家庭,14岁那年,他考入了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县立师范学校(长沙师范学院前身)。彼时,他就展现了对戏剧创作的兴趣。

1917年,田汉去日本留学,其间加入李大钊等人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

歌和评论,并与郭沫若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从东京回国后,田汉开启了激情澎湃的创作生涯:创办《南国》半月刊,成立南国电影剧社,推广新戏剧,赴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随着时局演变,田汉也开始为民族救亡而呐喊。

1932年4月,34岁的田汉与20岁的聂耳见面了。田汉当时在上海已很有名气了,聂耳对另一个音乐家张曙说:“你能介绍我与田汉认识吗?”不久,张曙就带着聂耳来到哈同路民厚北里田汉的家。田汉对聂耳说:“我看过你们的演出,那剧团不是你奋斗的目标,是误人子弟的场所。你若想到南国社来参加演出,我表示热烈欢迎。”聂耳高兴地答应了,从此以后他俩便成了莫逆之交,成了创造革命音乐的好搭档!

两人很快就迎来了首次合作。1933年年初,在徐家汇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摄影棚内,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邀请聂耳为影片《母性之光》谱写《开矿歌》。之后两年多时间里,他们合作的歌曲占据了聂耳存世作品的四

分之一。

1934年秋天,田汉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抗日为内容,创作了电影故事《凤凰涅槃图》,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夏衍拿到田汉的手稿,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于1935年正式开拍。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写在水稿的最后一页,当时的歌名叫《军歌》。

据夏衍回忆,文稿在编剧孙师毅桌上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发现后面几页被茶水弄湿了,歌词中有几个字已经模糊不清,夏衍和孙师毅仔细辨认后抄写出来。听说此事后,聂耳来找夏衍,提出自己想为它作曲。

作曲的时候,聂耳对歌词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田汉后来在他的《影事追怀录》中说:“我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聂耳三次修改了歌词。田汉非常欣赏聂耳,在关于国歌创作的手稿中,他写道:“我和聂耳合作过好些歌曲。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赋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并善于学习。他的作品爽朗明快,善于处理别

人很不易驾驭的语句。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句很不易驾驭,而他却处理得很自然、有力。”

聂耳是在日本修改的曲谱初稿和歌词,后把歌曲寄到上海,由电通影片公司于1935年5月9日正式录音。《风云儿女》上映以后,《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全国流行。两个月后的7月17日,聂耳在神奈川县藤泽市鹤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近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在盟军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名列其中。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写入宪法。

(综合《新周刊》、央广网)



# 干超:用爆款纪录片讲述“何以中国”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意思是说,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崧泽文化等史前文明,散落于中华大地,多元并存。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又提出“重瓣花朵”一说,即以中原文化为花心,其他不同文化类型为花瓣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近些年,一部名叫《何以中国》的纪录片,把这满天星斗与重瓣花朵拍了出来。把中华文明的发源与发展用影像和故事串联起来,宏大历史与细枝末节均生动再现。

“这是我从业以来拍过的难度最大的片子,但也是最值得的。”《何以中国》总导演干超说。

## 回答百年之问

2021年,干超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聊天,说到中国考古学的百年之问,秦岭脱口而出:“何以中国。”

从1921年仰韶村遗址发

掘算起,中国考古学已有103年历史。103年间,“何以中国”始终是一代代考古学者回避不了的核心议题。“商朝之前的历史,夹杂着神话和传说,上下五千年存疑。所以从民国开始,顾颉刚、王国维、傅斯年等学者就开始用考古资料实证、寻真了。”干超说。

《何以中国》纪录片项目启动后,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任总顾问,一百多位一线考古学家组成专家团。集结人马、踩点调研、专家访谈,随后,项目进入撰写文稿阶段。“这是我们一开始碰到的难关。秦岭老师组建了一个由年轻学者组成的素材编纂组,写出的素材非常严谨、专业,但如何让这些考古学成果落地为可被观众阅读的影视作品?为了寻找最终稿本的撰写者,我们找过很多文化人,最后联系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伟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周繁文,两位不仅专业过硬,而且文笔优美。”

干超回忆道。

随后,40万字的初稿几经推翻、删改,进而逐字逐句推敲,一年之后,精简打磨到8万字,形成“秦汉”“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家国”“天下”共8集内容。

文本就绪后,干超立即带领纪实摄制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历时700多个日夜,跋涉超4万公里,到访拍摄考古遗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馆等230余处。“足迹几乎覆盖全中国”。复原近70个电影场景,透物见人,让观众沉浸式走入那段历史。

## 纪录片人的样子

《何以中国》之前,干超还拍了部出圈作品《本草中国》。2016年,这部讲述传统中药制法的片子一炮打响,使他和团队一下子成了纪录片行业的红人。

为了还原中药原始地貌,干超只拍摄地道药材。但想拍到长在野外极限环境里的优质纯真药材,可不容易。“野生石斛长在绝壁上,很多采药



▲干超在拍摄现场

工甚至为此牺牲。再如长在原始丛林深处的龙血树,野山参和海拔几千米的何首乌,为拍这些我们不知道摔掉了多少架无人机。”

“拍纪录片是个体力活,每拍一部都能瘦个十来斤。”干超苦笑道。长相文弱的他,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来到英国念戏剧电影专业,回国后,进入上海电视台旗下的纪实频道工作。

“虽然已经过去20年,对纪录片的热爱一直没有变过。我们这个行业没什么钱,但让人内心充盈。”干超感慨道:“无论行业如何变化,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纪录片导演永远追求以真实为准绳,记录时代,记录历史。”

(据“人民文娱”微信公众号 高堰/文)

# 古代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始于唐代



▲古代中国首个“国庆日”是唐玄宗生日



▲《大唐开元礼》所载千秋节朝贺流程

“生日之礼,古人所无。……逮唐末以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据学者顾炎武考证,古人原先并不庆祝生日,是唐宋以后,才有庆祝生日之风。这是因为,古时医学不够昌明,女性分娩艰难痛苦,每个人的生日其实都是母亲受难之日。

从唐朝开始,我国开始刮起庆祝寿之风。贞观二十年腊月,唐太宗过生日,对大臣长孙无忌等说过一番话:“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

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唐太宗这话或许是出于真心,但也反映出他在位时庆祝生日已成流俗。

到了唐玄宗在位时,庆生之风更加猛烈。开元十七年八月初五,唐玄宗过生日,不但接受群臣祝贺,还亲自宴请,与大臣同醉。百官当即上表请旨,提议将每年八月初五都定为“千秋节”,每年千秋节都放假三天,全国臣民共

同庆祝。唐玄宗欣然答允,并将千秋节写进了法令当中,古代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开始了。唐玄宗之后是唐肃宗,他是农历九月出生,其生日定为“天成地平节”,与玄宗“千秋节”一样,也是每年都要庆祝。但天成地平节在九月,千秋节在八月,两个“国庆节”连着过,既耽误公务又消耗民力,所以不久之后,朝廷将二节合并,一块儿放在八月十五,一边庆祝中秋,一边庆祝两个皇帝的诞辰。

此后,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生日,都不再设立节日,仍把庆祝唐玄宗生日当作国庆。倒是唐文宗在位时,将生日十月初十定为“庆成节”,成为唐朝的第三个“国庆节”,放假时间与玄宗千秋节一样,仍然是三天。

(摘自《株洲晚报》)

# 京剧名家“留在上海迎解放”

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军渡江南下已势在必行。面对形势的变化,不少在上海的知名京剧演员都遇到了去还是留的问题。这一时期曾有不少人来向周信芳游说,向他宣传“共产党来了没有出路”的论调,并许以优厚的待遇加以诱惑,但是这一切都没能使周信芳动心。当然,革命力量也在争取周信芳。当时,中共上海地市委文委通过联络人吴小佩向党外外围组织剧影协会核心小组传达指示,要他们派人去同在京剧界享有赫赫声望的艺术大

师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先生正面接触,坦率谈心,做好工作。据周信芳的孙女周依霖介绍,当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一行来到周信芳家拜访时,周信芳亲自把他们迎到楼上的书斋。熊佛西开始以“谈戏”为名,但周信芳一下子就猜出了他们的来意。他郑重地说:“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请放心,我决不跟国民党走,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熊佛西说起他们还要去拜访梅兰芳,周信芳马上打电话联系梅宅,并

最后,看书也要讲时机。6月底,《华盛顿邮报》做了一个专题叫“从一岁到一百岁每一岁要读的最佳图书”,按照该报书评人的见解,三岁应该读《野兽国》,七岁读《卡尔文与跳跳虎》,八岁读《哈利·波特与魔法石》,16岁读《简·爱》,21岁读《太阳照常升起》,31岁读《掌握法国厨艺》。《堂吉珂德》可以留到67岁再看,因为到这个年纪,“你终于有时间读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了”。

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美国记者格拉德威尔都说,他们从未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泰晤士报》的编辑认为,30岁前就应该读《战争与

和平》,“这样你可以吹牛一直吹几十年。这本书也不难读,虽然长(可以跳过结尾论述历史的比较枯燥的部分)。而且它就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因为它写的是年轻的贵族如何寻找人生道路的。爱情、婚姻、战争、友谊,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度过一生的永恒的故事”。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经典栏目叫“荒岛唱片”,会问嘉宾如果去一个荒岛,只让带一本书,他或她会带哪本书。美国科普作家贾雷德·戴蒙德说,他会带《福尔摩斯全集》,这部书共1122页,包含四个长篇和56个短篇,他第一次读时还是个孩子,之后每隔十年都会再读一遍。

(摘自《视野》贝小戎/文)

最难写的汉字是“〇”?据说,“〇”是最难写的一个汉字,究其原因,一是它的笔顺难以规范;二是即便规范了也殊难写圆。其实,汉字中本没有“〇”这个字,人们在生活中,多将“〇”作为表示“圈”的符号或图案。一直到了1973年,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〇”作为词条收入以后,“〇”才正式被认定为一个汉字,读作“零”。

说来有趣,“〇”作为汉字前,不少文人即曾借“〇”赋诗,寄托情怀。

清代画家童二树长于画梅,曾精心绘制了一幅梅花图赠送友人。朋友非常喜欢,请他题跋留念。童二树在梅花图的两边各画了一个“〇”,朋友不解其意,他解释说这是一首《自感》诗:“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多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老。”原来画家在诗中所用的“圈圈”语意双关:前两句中的“圈”是动词,意指画梅花;后两句中的“圈”是名词,寓意不愿被名利的缰绳锁住,介入无谓的人事纷争。

(摘自《北京青年报》周惠斌/文)

最难写的汉字是“〇”